

●王子舟

丛书起始辨证

丛书起于何时，历来众说纷纭。其中一种意见最为流行，即推南宋二俞编辑的《儒学警悟》为丛书之祖。其实，丛书之制在南北朝齐梁时代就已成熟，萧齐陆澄辑《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梁代僧治纂《法集》六十二卷，皆已创丛书之成法。不过，为说明这个问题，还须先从丛书定义入手，因为丛书起始的歧义与丛书概念的纷争有关。名不正则言不顺，正名方能追原。

一、丛书概念的界定

“丛”字有“聚集”、“众多”、“细碎丛脞”的意思。“丛书”二字连用，见于唐代韩愈《剥啄行》诗中“门以两版，丛书于间”，意为藏书众多。首次用作书名，为唐陆龟蒙《笠泽丛书》。陆氏将自己繁杂细碎的诗文作品汇聚成书，按其性质说还不是丛书，

属个人别集。《新唐书·艺文志》将其列入了集部别集类中。

宋元时期，随着雕版印刷术的普遍使用，图书出版量剧增，汇编多种著作为一部大书的出版物大量出现，南宋嘉泰中俞氏兄弟的《儒学警悟》七集，收书六种四十一卷。咸淳中左圭的《百川学海》十集，收书一百种一百七十九卷。元季陶宗仪的《说郛》，其子书内容虽有删略，但汇集图书有千余种。丛书开始走上繁荣之路。延至明代，以“丛书”冠为书名的名实具备的丛书也灿然而出，如有程荣的《汉魏丛书》，胡文焕的《格致丛书》，钟人杰的《唐宋丛书》等。清代学者钱大昕谈到《百川学海》时，称其为“荟粹古人书，并为一部，而已意名之”⁽¹⁾。这种新形势图书——丛书的始祖。王鸣盛说“取前人零碎著述，难以单行者，汇刻为丛书。”⁽²⁾ 纪

供计算机处理使用。

(四) 分类法与主题词表的关系。分类主题一体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所以在主题词表的维护中要兼顾《中图法》与《科图法》的修订工作，如以分类法中的主要类目划分范畴索引，使之相互配合，以求整体效益，在指导思想上，检索以主题词法为主，分类号码主要用于文献排架和编制索书号码，类目宜粗不宜细，号码不能过长，这些工作需有良好的软件支持。分类法要有印刷本，后面应附主题索

引，以方便大多数图书馆使用。

(五) 具体应用办法。一般来说，全国只有很少几个图书馆要使用全部机读词库，多数图书馆仅使用其中的某几个部分。抽取办法可参照偏制专业主题词表的经验，既可按一定范畴和词族进行套录，也可以本馆所积累的词汇到词库中检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只要大家同心协力，做到是可能的。

(作者单位：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来稿时间：1991.2，编发者：丘峰。)

均等四库馆臣云：“合数家之书，以成一编者，俗谓之丛书。”⁽³⁾ 缪荃孙则言丛书是“取各书之全者，并序跋不遗”。⁽⁴⁾ 至此，各种单独著作汇成一部并有一总书名的书是为丛书，其义已明。

查阅现代各类工具书或学术专著，关于丛书概念的表述几乎无所差别，均包含两点内容：集多种单独著作成一套；具有一个总书名。这种共识既反映了人们对丛书本质的理解，也继承了前人对丛书的科学把握。按此观点，我们本应说萧齐陆澄的《地理书》是丛书无疑，因其符合丛书概念的范畴要求。清代学者早就洞察到这点，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杂编按语：“古无以数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题以总名者，唯《隋志》载《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又载《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是为丛书之祖”。《总目》为目录学中要籍，影响甚广。然而此论却鲜为人所涉及，今天也未引起多数学人的首肯，终作一家之言偏置僻处。清李调元亦执此说，文义与此同⁽⁵⁾，因其稍晚于《总目》，故疑出于《总目》。世人多将此说归于李氏，不妥。

近些年，有人对丛书进行过深入研究，学术界就丛书的概念产生了广义、狭义之别。如刘尚恒先生著文称：“从广义上讲，就是汇集两种以上专书别题一书名而成另一新的著作物；从狭义上讲，其所汇集的两种以上专书，不但要首尾完整，而且内容上必须超过两个部类以上，这样的狭义的概念才是丛书的本义。”⁽⁶⁾ 所谓超过两个部类，指跨经、史、子、集四部中的两个部类。由丛书这种狭义概念出发，陆澄的《地理书》内容为地理专类，未能超出史部范畴，自然也就不算为丛书了。刘先生认为，南宋出现的《儒学警悟》收书跨史、子两部类，符合丛书本义，为我国最早的丛书。学术界认为《儒学警悟》

为最早之丛书的观点，可说与这种狭义的丛书概念是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认真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狭义的丛书概念是错误的，卒难成立。原因有三：

其一，广义、狭义的概念前人未有区分，而是持狭义概念者所为。前人在给丛书下定义时，皆着眼于丛书这种新的著作物的形式，并由此推及其功用，未涉及所收子书反映的学科内容问题。也就是说，丛书概念的产生更多具有的是图书学上的意义。所以清代钱大昕、王鸣盛、《总目》编者、缪荃孙，乃致近人汪辟疆、叶德辉等，在论及丛书时，重点皆落在“总聚众书为一书”这个立脚点上。我以为，丛书作为一种新形式的著作物，它本身是相对普通图书而言的，其参照系是传统的单行本著作。给丛书下定义时就必须从丛书与单行本有何区别、特点上入手。探讨丛书收书内容的部类归属显然没有必要。

其二，从持狭义概念者的根据看，“丛”字虽有“细碎丛脞”的意思，但“细碎丛脞”还是收书数量的问题，丛书之“丛”的实质是指汇聚众书，使之有序。一部丛书可以举四部而囊括之，如《四库全书》，不过我们并不能从“丛”字中看出，一部丛书收列子书时一定要兼跨两部类，否则就不成其为丛书。另外，个别明清图书目录为丛书单独列类，如《澹生堂书目》、《书目答问》等，是考虑到了某些丛书收书跨经、史、子、集，杂而不易隶属的问题，但这只能表明丛书因其博采众书，内容有斑驳繁杂的特点，其本身并不排斥单列一种内容的众多著作的汇聚不是丛书，否则，那又该称之为什么呢？

其三，为丛书下定义时，一定要依据“约定俗成”的准则，不能凭自己的思维推理。各种丛书大量版行于世，编辑者、收藏者，及各类书目是怎样看待丛书的，这里就有个“约定俗成”的问题。清代丁丙辑

《当归草堂医学丛书》，收的全是医书，且又以“丛书”名之，显然丁丙自认为丛书无疑。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将丛书类分为“汇编”、“类编”、两大部类，子目内容单一的丛书皆入“类编”，也显然把内容相同的著作汇聚视为丛书。这种在编辑出版及分类编目实践中，把同一主题内容的不同著作合一的著作物当成丛书的现象甚为普遍，其中反映出人们对丛书概念的理解是一致的，不存在所谓广、狭二义。某种概念一经交换信息的社会群体公认和使用，就有了特定的意义，不再带有任意性。它是不能由哪些个别人改变得了的。

所以，我认为把丛书的所谓狭义概念视为“丛书”本义是不妥当的。狭义概念的提出，本身人为增加了丛书概念的混乱，弊多利少。而且据此狭义概念举《儒学警悟》为最早的丛书也不合适。是编收书六种，有《石林燕语辨》、《演繁露》、《嬾真子录》、《考古编》、《扪虱新话》、《萤雪从说》等。刘尚恒先生认为第一种为史部政书，其余为子部杂学，子书性质跨了史、子两部类。其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这六种子书悉入子部杂家类。前四种列入“杂说”与“杂考”之属，后两种列于杂家存目。六种子书性质均归一部，仍是专类图书，与《地理书》等性质无所不同。

二、丛书起始南北朝

丛书是汇集多种单独著作成为一套并具有一个总书名的出版物。其中每一种书都是一部完整独立的著作。这些单独的著作可以是一人的创作，也可以是多人的著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合数家之书以成一编者为丛书，入杂家杂编之属，“其一人之书，自有数种共为一部者，无所附丽，亦并录于此门。”即虽未明确说一人数种著作合一的著作物就是丛书，但从“并

录于此门”也可看到在乾隆时代，个人多种著作汇编一处的著作物也已被视为丛书对待了。当然，现在的丛书概念的范畴已非常明确，无论个人、多人的著作合编，都已作丛书看待了。我们述及丛书之始，应该以此种明确概念作指导，要有恰当的时空感。谈古代丛书要联系到现代丛书，说中国丛书不要忘了外国也有丛书。这样，提出陆澄的《地理书》、僧祐的《法集》为早期正式丛书，也就有了依据。

《地理书》人唐尚存。据《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载，《地理书》共有一百四十九卷，一录一卷。陆澄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澄本之外，其旧事并多零失。见存别部自行者，唯四十二家”。又称“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检《南齐书》、《南史》陆澄传，澄生于宋齐之间，“当世称为硕学，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地理书》竟不成，王俭戏之曰：‘陆公，书厨也。’家多坟籍，人所罕见，撰《地理书》及杂传，死后乃出。”陆澄卒于齐隆昌元年（494年），时年七十。是知《地理书》于此后才开始传世。

宋齐之世，图书编纂之风甚盛。陆澄职中书侍郎时，宋明帝曾敕其把汉上佛教论述篇章搜集一处，编了一部汇汉僧书、论、序、诗、铭的总集《法论》，凡十六帙一百零三卷。该书苞举群籍，古今皆备，收罗宏富有过于梁世《文选》。而且每帙都有一个帙名，如第一帙称《法性集》，第二帙称《觉性集》，第三帙称《般若集》等。如果把一帙当作丛书中一部子书，那么这套《法论》已经有别于一般的总集，具备了丛书的基本特征。当然，把它看作正式丛书的话，比《地理书》还早，中国最早的丛书因之要推到刘宋。但《法论》虽具丛书特征，形态本质上还是总集。其十六

帙全为单篇文章汇聚不说，每帙帙名主要起的是主题标引作用，致使各帙之间没能形成明显的形态上独立的关系。不过，在《法论》之后，有了这种纂集图书的丰富经验，陆澄又有将一百六十家地理著作编抄在一起的壮举，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地理书》于今已亡，从《隋志》记载来看，我们仅知道陆澄当时编辑的这部地理丛书部头不小。而且子目顺序有法，依各家单独著作的成书年代前后排列。可惜的是，除《隋志》外，我们看不到更多有关《地理书》的史料介绍。《隋志》仅著录了《地理书》的三十九家子书书目，“见存别部自行者，唯四十二家。”实有三家脱佚。其他一百二十一家子书书名及全部子书收书篇章是否有节略等，都已无从考察。陆澄之后，梁代任又就其书有所增补，而成《地记》二百五十二卷，《地记》亦亡，今也无从征考。

如果说《地理书》、《地记》因史料不足而难知其全貌的话，那么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梁沙门僧祐分别编纂的两部《法集》，则是有详备史料介绍的丛书了。

萧子良是齐世祖次子，官至太傅。为齐世重臣。他平生敦义尚古，礼才好士，夏日常设瓜饮甘果招待天下才学。永明五年（487年）正位司徒，“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⑦他也从事过大规模的图书抄集与编纂工作。萧崇信佛教，招致名僧讲经说法，自己著内外文笔数十卷行世。子良与陆澄同卒于隆昌元年（494年），时年三十有五。据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载，萧子良曾撰《法集》一百一十六卷，观《昉录》所列，《法集》收子书四十八部，子目有一部一帙者，如《诸佛名》十卷为第四帙；有一部两帙者，如《净住子》二十卷为第一、第二帙；有两部多部合为一帙者，如《僧制》一卷、《清信士子法制》三卷为第十二帙等。子目皆为单独著作无疑，无非因其

篇幅多少而分帙装盛而已。书名、卷数、作者、分帙，悉明陈详列。

沙门僧祐，俗姓陈，少年出家人江南建初寺。十四岁时家人密为访婚，祐知而避至定林寺。后受业于律学名家法颖。永明中敕入吴宣讲佛学，所获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二寺。又造立经藏，搜校卷轴，进行整理。天监十七年（519年）卒，时年七十四岁。僧祐生前所撰《法集》在《祐录》卷十二中也有载录，而且较之萧子良的《法集》更为详细。不但有子目，而且还有总序；每子书的序目又在总序目之后依次分列。序目俱全，层次分明。因僧祐《法集》子目不多，且有特点，现照抄于此：

释迦谱五卷	右一部第一部
世界记五卷	右一部第二帙
出三藏记集十卷	右一部第三帙
萨婆多部相承传五卷	右一部第四帙
法苑集十卷	右一部第五帙
弘明集十卷	右一部第六帙
十诵义记十卷	右一部第七帙
法集杂记传略七卷	右一部第八帙

上列诸书，今唯有《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弘明集》传世，余皆亡佚。览其子目，均以一书为一部，卷数不同，然而一部分装一帙，其整齐划一不说，更强调每部著作的完整性、独立性。再细索各子书的序目，此八帙八部六十二卷著作，前七部为详录三宝胜迹、记述四众福禄之作，都是有一定主题内容的专著。《释迦谱》录释迦史迹之故事，是汉土撰述佛传的始作（从三藏中选集而成）。《世界记》讲佛国诸界、动象人物（从三藏中选集而成）。《出三藏记集》为佛经目录，专载目录序记。《萨婆多训相承传》记叙众罗汉菩萨。《法苑集》总“法门常务”、“僧众恒仪”之缘始（从三藏中选集）。《弘明集》聚古今明篇、道俗雅论为一集，成现存最早之佛

教总集。《十诵义记》是集法颖师讲戒律十诵旧闻，缀总条贯而成，为戒律学著。最后一部《法集杂记传略》，收杂记碎文未入前七部著作者，如山寺碑铭、僧众行记，条例无附，辄为一书。亦不失为有特点之史料汇集的单行著作。八帙同出僧祐之手。而且全为佛教内容。因此僧祐的《法集》属个人专题著作聚总的丛书。从《法集》子目中收有《祐录》，《祐录》又记载了《法集》这个有趣的情况看，僧祐的《法集》成于《祐录》之后是肯定无疑的。现在《祐录》有十五卷，较《法集》中《祐录》多五卷，此后五卷是在《法集》编成后又补写的，故有《法集》中《祐录》卷数为十的现象。又，《祐录》中所载录序，多言及“天监岁次”，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僧祐的《法集》成于梁之后。

从《地理书》、《地记》，到两部《法集》，事实证明丛书起于南北朝齐梁时期，绝非虚妄之说。无论陆澄、任昉、还是萧子良、僧祐，他们本身都是当时图书编辑出版的著名活动家，这些大部头丛书的编纂问世，为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梁释僧祐，又为一代目录学巨擘，故他辑纂的丛书《法集》，在形态上

就更完备、科学，至于丛书编辑工作仍有启发、借鉴价值。丛书可以分为综合性丛书、专科性丛书，各溯其始也是可以的。如非及此，单讲中国丛书之始，陆澄的《地理书》、僧祐的《法集》是最早的丛书。这当无可非议。

参考文献

- (1) (清)钱大昕·潜研常全书·文集卷三十跋百川学海·潜研常钱氏·道光二十年(1840)
- (2) (清)王鸣盛·蛾术编卷十四《合刻丛书》·商务印书馆，1958
- (3) (清)永江·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11
- (4) 缪荃孙校刻《儒学警悟七集》序·见(南宋)俞鼎孙、俞经编《儒学警悟》·京都文楷斋·民国十三年(1924)
- (5) (清)李调元·童山文集卷三·函海后序
- (6) 刘尚恒·中国古籍丛书概说·文献，1981、7：141~155。
- (7) (梁)萧子显·南齐书·萧子良传·中华书局1972 698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
来稿时间：1990.7。编发者：刘喜申)

(上接 55 页)

的研究表明，藏书中的一半约占全部藏书流通率的 85%，绝大多数流通率高的图书仍然保留在传统的开架书库；只有那些利用率很低，即 3 年内没有外借过的书才会贮存在利维亚桑系统。该校的官员也说，即使在最繁忙的时间，从该系统中找出一本书也不会超过 10 分钟。找书速度问题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并不尖锐。该自动化系统仅仅是作为该校图书馆扩建计划的一部分。图书馆扩建计划的另一部分是办公楼和辅助书库。

谭尼斯馆长又说，我认为没有利维亚桑我们就得不到扩建基金，扩建计划就会

成为不能兑现的许诺。利维亚桑系统并不意味着可以减少工作人员。官员们说，因为大量的常用书仍然在传统的开架书库中。诚然，对系统的真正评价要等到它被全校师生所接受，如果系统工作正常，它将可能扩大到更多的图书馆；要是不能正常工作，可能将此建筑改作常规方法使用。该馆分管后勤与计划的副馆长道格·戴维斯(Doug Divis)说，考虑到万一利维亚桑失败，我们打算如同把大楼电梯孔改作小房间使用一样的办法，妥善加以利用。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图书馆。来稿时间：1991.3。编发者：刘喜申)

collectively by special agencies. The author also put forward five other jobs that should be done well, such as, the formulation of rules and regulation for selecting words.

CN-MARC——Indexing

After-Control standard——Approaches

G254·39

The Origin of Series: Differentiation and Demonstration / Wang Zizhou//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91.17 (4) .-72~76

Those who hold a viewpoint much in vogue about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series believe that the earliest one is none other than the book “A Keen Comprehension of Confucianism” (Ru Xue Jing Wu) (1202) collected by Yu Dingsun and Yu Jing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ctually, the system of series had already ripened into maturity during Qi and Liang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Books of Geography” (Di Li Shu) collected by Lu Cheng of the Southern Xiao Qi Dynasty (479–502) and the “Collection of Laws” (Fa Ji) compiled by Seng You of the Southern Liang Dynasty (502–557) all had achieved in the proper form of series. In actual practice of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classifying and cataloging, it is a very common phenomenon to treat different books of same subject as series. This shows that people hold an identical view of understanding series, and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road sense and the narrow sense of it. To raise the question of the narrow sense of series is to add to the confusion of the concept of series. And it is also not proper to cite the book “A Keen Comprehension of Confucianism” as the earliest series according to the narrow sense of it.

Series——China

History of books——Studies

G256.1

An Afterword of Collating “Han Fei-Zi” / Zhang Jue//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the Library Science.-1991, 17 (4) .-77~82

It is highly commendable for collators of ancient books to collate the original copy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If the second-hand material is used, one will make mistakes without knowing it. The harmful practice in the collation circles of replacing the firsthand material by the secondhand one is worthwhil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article has evaluated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some editions of “Han Fei-Zi”, e.g. Gu Guangqi’s “Han fei-Zi Shi Wu” (Mistakes Seen in Han Fei-Zi); Chen Qiyu’s “Han Fei-Zi Ji Shi (A Variorum of “Han Fei-Zi”) and Wang Xianshen’s “Han Fei-Zi Ji Jie” (A Variorum of “Han Fei-Zi”).

Rare books——Studies

“Han Fei-Zi”——Collations

G256.3

(周钰萍、张木早译，周钰萍校)